



**Osaka University
Forum on China**

Discussion
Pap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No.2020-3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当代中国政治转型

田中仁 (阿路思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当代中国政治转型

2020年6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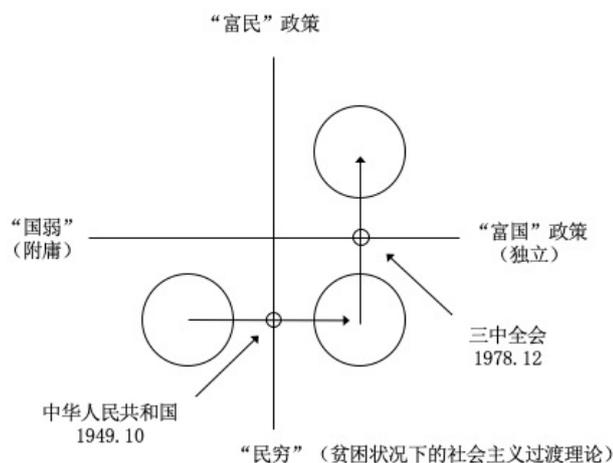
田中仁[†]（阿路思[‡]译）

[†] 中国南开大学·讲座教授（大阪经济法科大学·教授）

[‡] 大阪大学博士（国际公共政策学）

前言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常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转折点。此次会议之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代开启，毛泽东的“革命”时代宣告结束。西村成雄就这两个时代下中国社会整合的转型作出如下分析：



中国社会整合的转型

“如图所示，横轴表示为摆脱‘国弱’状态而采取‘富国政策’，纵轴表示为摆脱‘民穷’状态而采取‘富民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处于中共认识到当下民穷状态已无法继续推进富国政策这一历史转折点。由此，中国的社会整合在扩大民众可支配收入政策，即富民政策的基础上发生了质的转变。……1979年以后的中国政治，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过去的思想及理论框架迎来了重大转变，中国近代史的方方面面在此巨大的转型冲击下得到多角度的重新审视。”¹

此外，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地位，众多学者提出如下观点。毛里和子将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定义为极权主义体制时代和威权主义体制时代²。加藤弘之评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由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转型的起点³。在涉及人民共和国体制相关内

¹ 西村成雄. 中国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的新视角 (M). 研文出版, 1991. 16-17

² 毛里和子. 现代中国政治 (M).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1993. 230-234 “从以政治体制为中心的考察出发，毛泽东时代适合称之为继承了传统的极权主义政治体制。而自从 70 年代开始，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四个现代化’使经济发展成为一切的重中之重，此时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便免不了成为改革的对象。因此，邓小平时代可称之为威权主义体制时代，或者至少是向威权主义体制过渡的时代。”毛里和子. 现代中国政治 (M).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1993. 230-234

³ 加藤弘之, 久保亨. 进化中的中国资本主义 (M). 岩波书店, 2009. 224-225, 249 “经历 1937 年爆发的中日全面战争与此后的国共内战，1949 年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的胜利。1950 年代启动的苏联模式计划经济体系在“大跃进”、“十年文革”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1978 年的改革开放从一个‘既不是计划也不

容时，三宅康之提出 1950 年代所构建的党·政·军三位一体的统治结构在文革后得以重建，其制度化在 1980 年代之后得到进一步发展⁴。尽管如此，“改革·开放”方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并未成型亦未被明示，在其最终成型之前实际上经历了一段摸索期⁵。

1998 年 12 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纪念大会上发表如下讲话：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十年后的 2008 年 12 月，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发生了三次伟大的革命。分别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2018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称，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同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

从学术界将 1978 年的“转折”视作当今中国政治起点的倾向上来看，历史的复杂多面性被忽视，1970 年代的历史意义仿佛仅仅只存在于为“转型”作铺垫。然而，在一些问题上，只专注“转型”的历史叙述却有意或无意掩盖了历史本来的连贯性。

本文通过对与当代中国政治转型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相关的四个论点，即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1976 年的中国政治，毛泽东思想的再定义，中国政治的转换与国际机遇，相关叙述的对照和梳理，旨在发现改革开放史研究领域中寻找新的问题，新的论点。

是市场’的体制出发，打破一个又一个的禁忌，缓慢向市场经济方向转变。进入 1990 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目标模式的提出，表明了中国正式开始转向市场经济，到 2001 年加入 WTO 时，狭义的市场转型得以实现。经历两次战争，中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再由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如此巨大的社会变迁中，虽然中国已经逐渐孕育出基于传统基层社会之上的资本主义，但纵观中国历史，每个时代同时也面临许多不确定性。中国对外宣称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就像在本书中所分析的那样，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间，中国经历了向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现如今已不再是过去所谓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变成了与之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从完成狭义市场转型角度出发，此处使用‘资本主义’一词。”加藤弘之，久保亨。进化中的中国资本主义〔M〕。岩波书店，2009。224-225，249

⁴ 三宅康之。党政军三位一体的“统治结构”〔C〕。//浅野亮，川井悟。概说近现代中国政治史。MINERUVA 书房，2012。386-387“从长期来看，1950 年代构建的党政军三位一体的统治结构在文革之后以恢复原状的形式被重新构建，并延续至今。另外，体制内的政治运作方式也发生着显著的变化。毛泽东时代未能制度化的政治运作到了邓小平时代后期终于步入正轨，党大会·全人代得以定期召开。换届选举，废除终身制，人事更迭的明确化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⁵ 高原明声，前田宏子。面向开发主义的时代：1972-2014〔M〕。岩波书店，2014。2-3“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开端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改革开放的方针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逐渐形成的。“改革开放”一词首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时间是 1984 年 5 月 18 日，《邓小平文选》正文里最初出现的“改革开放”一词，也是在 1986 年 3 月 28 日的谈话内容中，而到 1987 年，《人民日报》中出现的次数猛增到 501 回。”

一、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

傅高义的《邓小平改变中国》⁶一书，在梳理了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领域中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对相关历史做出了周到严谨的叙述。本文从该书中整理了部分对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相关叙述，具体内容如下。

- 有的文献记录错误的认为，陈云的那篇由胡乔木润色的讲稿改变了会议气氛，但实际上在他演讲之前气氛已经起了变化。在他之前已经有人在小组讨论里提出了这一点。各小组的发言者长久压抑的怒气纷纷喷涌而出，他们强烈反对华国锋和汪东兴阻挠那些被冤枉的好干部回来工作。发言者要求为受迫害的干部平反，并要求谴责已故的康生——他对许多人的死亡负有责任，而且，他的前秘书李鑫当时甚至仍在协助汪东兴阻止平反冤案。正是这种情绪，使人们对华国锋和汪东兴的不满愈烧愈旺。（330-332 页）
- 中央工作会议进行的前几天，会议气氛就已经反映了在北京市委（负有维护北京治安责任）的行动中。林乎加召开北京市委扩大会议，并在会后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发布了“四五”示威事件不是反革命的声明，该声明刊登在 11 月 14 日的《北京日报》、15 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纷纷转载。18 日，华国锋也为《天安门诗抄》亲笔题写了书名。（332-334 页）
- 会议结束时，汪东兴提交了一份书面检讨。他承认自己在处理专案工作上犯了错误。吴德和李鑫也受到了批评，张平化则在三中全会之后不久就被撤职。吴冷西、熊复和胡绳跟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站在一边，也受到了严肃但较为温和的批评。（335-336 页）
- 12 月 13 日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代表从根本上摆脱毛泽东时代。与会者有理由期待，那个由大规模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僵化的意识形态、英雄崇拜、高度集体化和全面计划经济所构成的痛苦时代终于结束。（344 页）
- 从某种意义上说，三中全会是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庆祝会，是向中国民众和外部世界宣布新路线得到正式批准的仪式。（345 页）

金冲及作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长期主持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各项工作。其著作《二十世纪中国史纲》⁷是他长达半个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生涯的总结之作。此书中对中央工作会议与三中全会的具体叙述如下：

- 中共中央召开了三十五天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是三中全会的重要准备。会议第三天，陈云在东北组作了一篇引起很大震动的发言。此后，会议转到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件事上来。经过激烈的争辩，取得了共同的认识。华国锋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12 月 13 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提出了实现历史转折面临的一系列关键问题，为十

⁶ 冯克利译。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2011)

⁷ 金冲及.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指导思想。它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历史的新时期新道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宣言书。（1135-1139 页）

- 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的意义远不限于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而且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面，使它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第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的起点。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要求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学风，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经过这次全会后，事实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1135、1141-1142 页）

天儿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新版》（岩波新书 2013 版）⁸是一本在日本出版的通史著作，其中有关这两次会议的相关叙述如下：

- 华国锋在其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的致辞中提出三项重要议题，即①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②商定 1979~1980 年间国民经济的安排、③邓小平提议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而工作中心转移问题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项议题而已。没过多久，陈云作了“工作重心转移是所有问题的关键，解决文革遗留问题、恢复名誉至关重要”的发言，并得到胡耀邦，万里，聂荣臻等人的支持，邓小平领导班子一举占据非常有利的形势。与此同时，11 月 14 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批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宣布四五天安门事件是彻底的革命行动，这给当时积极批判邓小平的华国锋以巨大打击。中央会议除平反冤案恢复名誉，以及对“四人帮”展开调查之外，确认了“两个凡是”理论及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发展中“左”的错误。会议闭幕时，邓小平强调要解放思想，发扬民主，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121-122 页）
- 中央工作会议过后，被称为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会议虽由华国锋主持，但会议内容集成了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使“摆脱文革路线”得以确立。虽然离邓小平领导核心体制的确立还有一段时间，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使建国以后毛泽东及其路线控制下动荡的中国迈出了新的一步。（122 页）
- 三中全会确实成为重大路线的转折点。然而，华国锋依然掌握着党·政·军的最高权力，支持华国锋的汪东兴、吴德等人的指挥部仍然存在。回望邓小平形成和巩固其领导核心体制的过程，不难发现这一切可以说是一场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通过精心安排，谨慎的将华国锋等人步步逼入绝境。①路线·政策的转换、②瓦解支持华国锋的指挥部、③夺走华国锋手中的权力成为这一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124 页）

⁸ 天儿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新版 (M). 岩波书店, 2013.

台湾学者陈永发在其所著《中国共产党七十年》⁹一书中，写到：

“1978年11月，元老派向华国锋挑战的时机终于成熟。当时，华国锋召集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经济计划，不料这一次竟然成了埋葬他政治生命的会议。会议上元老陈云首先发难，要求彻底解决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案件，并为一些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作定论。其他老干部纷纷响应，进而要求检讨华国锋两年以来的领导工作，尤其是批评他对‘两个凡是’的主张。时移势转，华国锋迫于指斥，终于逾越他对平反天安门事件的底线，甚至宣称群众的参与其事是革命行动。同时也宣布比较没有争议的死人和老人，像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人无辜，必须立即恢复名誉……尤其是透过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彻底剥夺了中央办公厅成立专案组的权利，把审查干部的权利完全集中转移到胡耀邦控制的中央组织部。华国锋开始溃退了。”（901页）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¹⁰中收录了一篇由麦克法夸尔执笔的论文<毛泽东的继承问题和毛主义的终结>，其中有关这两次会议的部分相关叙述如下。

- 到11月份，各省和军区的高级官员们都倒向了邓的一边。这个会议上陈云将这次会议迅速转变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的全面讨论。他希望对受到玷污的薄一波、陶铸、彭德怀作出公正的评价。同时康生所犯下的严重错误应晓之天下。陈云坚持认为天安门事件的积极意义应当得到承认。陈云的讲话激起了谭震林等人表示支持的发言。华国锋显然提早预料到了这些，使自己适应了这一攻势。11月5日，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是“完全革命的”。次日，华国锋为经官方批准出版的第一本天安门诗集亲笔题词。随着其立场的后退，凡是派也开始准备接受为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大批人平反昭雪。（433-434页）
- 华国锋和凡是派所遭受的一个更具危险性的打击是，一批受害者在三中全会上进入了政治局，从而使中央工作会议的结果得到制度上的施行。这种困境使他们抛弃了极左思想。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阶级斗争不再是“纲”，取而代之的是四个现代化。“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遭到抛弃。邓在他对全会所作出的报告中指出，现在还不到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本人进行全面评价的时候。但全会所通过的政策却体现了一种过去十年的急剧转变。三中全会否定了大寨模式，华国锋的工业发展计划未得到采纳。（434-436页）

高原明生与前田宏子所合著的《面向开发主义时代：1972-2014》一书是岩波书店出版的新书系列《如何看待中国近现代史》（共六卷）里的第五卷。书中提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始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说法不符合事实，实际上是在会议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才逐渐形成的。”该书试图还原那段不同于迄今为止被人们所广泛认知的历史。书中有关这两次会议的叙述如下：

⁹ 陈永发.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修订版 (M). 联经出版, 2001.

¹⁰ 麦克法夸尔. 毛泽东的继承问题和毛主义的终结 (C). //费正清, 麦克法夸尔.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最后发言中，华国锋承认“两个凡是”理论的不妥，并表示接受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真理标准”的意见。至此，党的思想路线，即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所遵循的最根本的指导原则和思想基础的转换得以确立。然而，政治路线随即彻底转换尚且言之过早。（共产党在特定历史阶段中，为实现政治目标而制定的基本政策被称为“政治路线”）。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召开之际，虽然作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这一决定，但绝大多数与会者并非将此决定视作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华国锋的讲话中虽提到“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导下”转移活动重点，但总路线却仍然包含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此外，三中全会公报中虽然强调认真解决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中存在的问题，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但李先念在 9 月份的讲话中已详细谈过此内容。也就是说，78 年底的政治路线转换并不彻底，改革开放的方针也没有被确立和明示。（35-37 页）
- 通常认为，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路线的“完胜”而宣告结束。确实就人事而言，周恩来夫人邓颖超、胡耀邦、以及与邓小平关系密切的王振成为政治局委员，并且包括胡乔木在内的邓小平阵营中的九个人被追加选任为中央委员。虽然领导层重视安定团结作出不辞退任何人的决定，但汪东兴副主席的职位没有实权，且小组会上决定辞去与华国锋和汪东兴走得很近的陈锡联和季登奎的领导职务。接受批判的华国锋承认了“两个凡是”理论的错误，从中央工作会议到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主持大局，领导层中邓小平地位的上升得到人们广泛的承认。（38-39 页）

二、1976 年的中国政治

在康生（1975 年 12 月）、周恩来（1976 年 1 月）、朱德（1976 年 7 月）相继去世后的 9 月，凌驾于三人权力之上的毛泽东去世。毛泽东的死以及 10 月份对四人帮的逮捕，宣告了“一个被奉若神明的革命家只手就能撼动整个国家的时代结束了”¹¹。那么，1976 年和 1978 年的这两次转折之间的关联性究竟要如何解释呢？本章整理了 1976 年 4 月的四五运动与 9-10 月期间毛泽东去世及四人帮事件的相关叙述，提供参考。

1、傅高义《邓小平改变中国》

- 周恩来死在毛泽东之前，使毛泽东得以左右周恩来追悼会的安排：他试图借机抑制群众对周恩来的怀念，对周一生的成就只给予尽可能低的评价。可是，毛这些手段的效果适得其反。很多中国人非但不服气，反而为深得他们敬仰与爱戴的周恩来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而愤愤不平。四月五日，人民用行动表达了自己的意愿。至少在民众政治觉悟最高的北京，毛泽东已经失去民心，周恩来才是百姓心目中的英雄，邓小平也有足够的民意支持成为主要领导人。（238-239、253 页）

¹¹ 傅高义. 邓小平改变中国 (M). 天下文化, 2012. 254

- 4月7日，毛泽东对政治局提出的两条建议被传达。第一，代总理华国锋担任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第二，当时仍未被正式撤消党政军职务的邓小平，免去全部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政治局随后批准毛的建议。毛泽东把权力交给华国锋，免去邓小平的一切正式职务，这就为华国锋领导国家扫清了道路。（254页）

- 5月11日，毛泽东心脏病发作。那天之后，他就不能再看文件了。6月26日，他的心脏病第二次发作，9月2日又发作了一次，9日去世。10月6日，三十五分钟之内，没放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四人帮”的威胁就解除了。同一天的晚上，政治局会议一致推举华国锋担任党的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259、265-267页）

- 毛的激进思想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分离过程，早在1974年毛泽东宣布支持安定团结时就开始了。1975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以及1976年初华国锋掌权时期一直在继续。“四人帮”被捕后，激进的毛主义终于失去了最后的有力拥护者。”四人帮“的覆灭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种想通过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去改造世界的希望破灭。中国人在这种局势的转折中表现出来的兴奋和释然，后来将变成支持改革开放务实政策的深厚基础。（270页）

2、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 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国笼罩在极度的悲痛中。“四人帮”公开采用各种手段阻挠群众的悼念活动。重病中的毛泽东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指定华国锋为周恩来的接班人。2月2日，经毛主席的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3月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点名批评邓小平的《毛主席重要指示》。（1103-1105页）

- 从3月底开始，北京的各界群众，纷纷走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献花圈，张贴或朗诵诗词，发表讲演，悼念周总理，痛斥“四人帮”。4月4日，华国锋召开政治局会议，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为反革命事件。在4月7日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台面向全国做了如下广播：（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1106-1107页）

- 9月9日，一生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出其他人难以替代的卓越贡献的毛泽东逝世。他的逝世，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10月2日，经华国锋和叶剑英共同商议，决定以召开会议的方式，宣布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6日（实行该活动后的）当天深夜，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此决定后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得到追认。（1108-1109页）

-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国家和民族处在危难之时，显示出何等巨大而顽强的生命力。这样，“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华民族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111页）

3、天儿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新版》

- 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是建国以来，首次群众自发形成的大规模表达诉求的运动。4月7日的政治局会议基于毛泽东的指示作出了两项决定，即①由华国锋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②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观察”。（111-112页）

- 9月9日，巨星毛泽东病逝，终年82岁。建国以来，领导中国且改变无数人命运的

领袖突然离世，必然暗示着中国即将发生巨变。毛的死，激化了中央的权力斗争。四人帮企图卷土重来，与此同时，阻止四人帮的势力也迅速形成“反四人帮联盟”。其中包括华国锋等文革派中的稳健势力，李先念等周恩来系的中间派官僚，王震等一批复位的干部，以及叶剑英等军长们的势力。10月6日，“反四人帮联盟”仅仅只用一小时的时间，一举从权力的位子上将四人帮拉了下来。（112-114页）

- 迅速得势的华国锋在担任此前国务院总理一职的基础上，又担任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成为独揽党·政·军三权的领导人。然而，华国锋的领导，其地位并不稳固的同时，还存在以下两点问题。①首先是毛泽东路线的继承问题。华国锋手上的权力并未经过正当的程序，仅凭毛泽东的那一句“你办事，我放心”的“遗言”。②其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经济的长期停滞、疲敝状态非常严重，华国锋也不得不以他自己的方式来继续邓小平复出后进行的一系列整顿。当继承革命与经济建设这一对水火不容的两个课题摆在面前时，他将两者并行推进的做法与其说大胆，不如说是完全不计后果的。

4、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

- 1976年1月，周恩来死后，毛提拔华国锋代理总理职务之后，由亲江青的陈锡联接管军委日常工作，邓小平靠边站。随后，毛泽东宣布撤消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仅保留其党籍，以观后效。然而在江青和邓小平的斗法中，受益最大的仍然是华国锋。在事件之后，华国锋被任命国务院总理兼党的第一副书记。（843-845页）

- 毛泽东死后，中共中央依旧是三派人马的角逐之地。一派是以上海为基地，控制中共中央宣传机器的江青。一派是文革初期受过打击的中共元老，包括叶剑英和李先念等人。另一派便是搭乘文革列车进入权力核心的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江青和王洪文高姿态的做法激怒了华国锋和汪东兴，10月6日，他们接受叶剑英和李先念的建议，逮捕了四人帮。（874页）

- 华国锋清除四人帮虽然得到许多干部的拥护，但是毕竟弥补不了众望难孚的弱点。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毛泽东听取报告，随便写了一张“你办事，我放心”的纸条，这张纸条便在此时权充继位遗诏。紧接着华国锋做出两项重要决定，一是竭尽全国之力，在天安门广场日以继夜的赶工，建立起一座陵墓，让毛泽东躺在水晶棺中。一是决定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并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874-875页）

5、麦克法夸尔《毛泽东的集成问题和毛主义的终结》

- 1976年1月，毛泽东选择华国锋作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当时政治局内的政治构成对“四人帮”并非不利。由于邓小平和叶剑英靠边站而没有影响力，王洪文和张春桥可以同华国锋合作，以其在政治局常委会内的优势地位来统治全党。（407页）

- 4月的天安门事件说明了，人们拒绝了毛对接班人的选择。他们对周的敬意表明了他们要求邓小平回来做周的合适的继承人的愿望。那天晚上出席政治局会议的每一个人都明白邓的复归将为他们带来灾难。4月6日当晚举行的会议上，政治局对这次“事件”作了“反革命动乱”的结论。7日，毛泽东指示撤消邓小平所有职务，但允许他保留党籍，并指示立即提升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兼中央第一副主席。（412-414页）

- “四人帮”的战略错误是他们未能与受益者推进共同的事业。他们战术上的错误是在毛去世后他们所有的人都留在北京。此时“四人帮”有三个行动计划分别是，维护他们对毛意识形态正统的继承权；企图控制党中央机构；准备武装对抗。10月5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在北京郊外西山解放军总参谋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大家一致同意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及其主要支持者抓起来。10月6日，部队奉命执行这一决定，文化大革命就此结束了。（417-422页）

- 从一开始，华国锋的领导权旧部能顺利行使，它被一种难以解决的两难困境所围绕，代表两难困境的就是他从毛和周身上继承下来的相互矛盾的遗产。华的合法权力只是源于毛的承诺，于是他采取迅速的行动以确保只有他才能继承毛的遗产。10月8日，中央宣布由华国锋负责主持编辑、出版已故主席的第五卷选集。与此同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为毛建造纪念堂。华本人的护身符虽然是现在常被引用的毛所说的一句话：“你办事，我放心”，但仍有必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表达出一种纪念堂祭祀所象征的感情，于是华适时地批准了汪东兴提出的一个公式，这个公式把毛泽东思想具体化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422-423页）

三、毛泽东思想的重新定义

无论是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毛泽东画像，还是印在人民币上的毛泽东头像，无不表明当代中国政治中，毛泽东被视为中共一党统治正当化的象征。从1981年6月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历史决议）开始，当代中国政治中的“毛泽东”要因逐步显现。以下为前述著作中从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到“历史决议”通过这一期间，与重新定义毛泽东思想相关的叙述。

1、傅高义《邓小平改变中国》

- 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感受到群众对结束文革、开启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广泛支持，因此他允许了两次重要论战的开展，这扩大了中国人的言论自由。这两次论战依次是民众自发产生并对公众开放的，它最初出现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道墙上，即后来的“西单民主墙”。另一次是党发起的论战，只局限于党内，它使一些知识分子和党内主管文化政策的领导干部走到了一起，探讨他们在新时期工作的知道方针。（352页）

- 1979年3月，曾经当过兵的北京动物园职工魏京生，大胆迈出突破破旧框框的一步，他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一文，点名批评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魏京生的这些公开言论使他立刻成为全球媒体的关注焦点。当抗议者吸引大批观众，开始了反对中共领导的根本制度时，邓小平断然采取措施压制了这种挑战。魏京生在民主墙贴出要求民主的大字报四天后，他就被抓了起来，邓小平的压制也在继续。（358-359页）

- 1979年月，理论务虚会召开。胡耀邦的会议开幕词鼓励与会者解放思想，畅所欲言，这在他们中间引起了热烈的回应。与此同时，陈云和李先念等人开始表示担心：对党的

批评如今走过头了，有可能威胁到党维护纪律和秩序的能力。3月，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¹²，说明自由的界限。这成为此后二十多年判断文章、书籍或电影在政治上是否违规的指导原则。（360-365，366-367）

- 1979年10月建国三十周年演说中，叶剑英承认文革是一个严重的政策错误。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它使党能够结束空洞浮夸的口号，坦率解决国家所面对的问题。为了对党史进行评价，邓小平成立了一个由坚定的改革派胡耀邦带头的小组，两个保守的正统思想捍卫者胡乔木和邓立群，分别担任起草委员会主任行政负责人。（489-490页）

2、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 1979年1月，理论务虚会在北京举行。与会者畅所欲言，虽然对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但会上也出现另一种极端的错误意见。在历史处在重大变动和转折的时刻，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开始在一部分人中间蔓延。这种现象集中地表现在北京所谓“民主墙”的一部分大字报中。例如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张贴大字报，并私自编印和散发一份油印刊物《探索》，诽谤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3月30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该报告从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全局出发，重申并深刻地阐述了在中国问社么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根本地政治问题。（1144-1146页）

-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宋任穷中央组织部长的推动下进入全面展开阶段。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影响最大的是1980年2月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平反昭雪，回复名誉，纠正了起建国以来的最大冤案。与此同时，还采取一系列措施，调整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如1979年1月起，开始摘掉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给予他们以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对待当年国民党的投降派也做了政策上的变动。（1155-1156页）

- 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公审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审判。它体现了人民的意志，显示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巨大威力。（1171页）

-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坚决顶住当时出现的一股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这样做的结果，既分清了理论和政治是非，又加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1172页）

3、天儿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新版》

- 1978年秋，以“西单民主墙”为标志的宣扬民主自由的运动中，《探索》杂志主编魏京生署名贴出实现“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化）”的主张。像他这样在大字报上公开对抗中共独裁

¹² 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体制的内容还有很多。在邓小平积极呼吁解放思想的当下，人们愈加渴望能够实现民主化。然而，1979年3月，在邓小平的一声号令下，这场要求民主化的运动遭到镇压和封锁。邓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实用主义的信念下，他强烈意识到，政治稳定对于推进经济建设是不可或缺的，稳定党的领导地位和核心思想是非常重要的。（135-136页）

- 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就华国锋的“错误”展开讨论，特别是继承毛晚年的左倾路线和“两个凡是”成为问题的焦点。与此同时，从80年12月到81年1月之间实施的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审判”中，法庭宣告文革核心推动者——江青、张春桥、陈伯达等人的罪证，并且下达了死刑和监禁的判决。这是继给文革中遭到迫害的刘少奇恢复名誉以来第二次对文革的彻底否定。

- 在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历史决议得到审议和通过，对文革的定性和对毛泽东的评价成为本次会议的重点。决议得出以下两个结论：（一）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二）指出毛泽东在文革中虽然犯了严重错误，然而就他的一生来说“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华国锋也由于与文革和毛泽东的关系，被迫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遭到胡耀邦和邓小平的强烈批评。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一扫此前领导体制中的革命色彩，决定取消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实行总书记领导下的集体领导制，胡耀邦就任初代总书记。然而，事实非常明显，只有邓小平才是握有实权的“最高权力者”，胡耀邦和赵紫阳作为其左膀右臂，三人共同成为驱动改革车轮的三驾马车。中共十二大标志着邓小平时代的开启。

4、陈永发《中国共产党革命七十年·修订版》

- 1978年出现的“北京之春”中，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利用毛泽东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的四大自由，在壁报上发表官方不愿看到的言论和官方不愿讨论的各种课题，并组织民间社团。他们中有人甚至要求在四个现代化以外，增加第五个现代化，也就是所谓的政治的民主化。当时，邓小平及其支持者的有意纵容，因为这些言论可以对华国锋体制及“两个凡是”的主张进行批判。然而，青年学生的活动超出了邓小平可以容忍的限度，于是魏京生等人被捕。邓小平发现毛泽东生前所主张的四大自由对中共社会主义民主不利，于是政府下令将其取消。（916-917页）

- 如同毛泽东检讨六大以来的中共党史，邓小平也利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来树立自己思想的一贯正确性。同时也利用对党史的检讨平凡和翻案，为自己建立权力的新基础。（895、905页）

- 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是邓小平体制的特色，而四个坚持是邓小平改革的先决条件。在邓小平的思想中，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都被简化，凡是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都被予以扬弃。邓小平四个坚持的真正底线在于共产党的统治，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中只有符合共产党统治利益的部分得以保留。（921-922页）

5、麦克法夸尔《毛泽东的集成问题和毛主义的终结》

- 聚集在西单民主墙周围的是一批大多受过初中或高中教育的年轻人，他们探索广泛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尽管幼稚，但却对在中国实现“第五个现代化”，即实现民主的可能性显得十分热心。邓对民主运动的第一反应虽然很积极，但在 1979 年 3 月，他公开表示国家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不禁使人联想到毛在 1957 年反右斗争开始时的举措。魏京生最终遭到逮捕，被判有罪，1980 年的人代会上，宪法有关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和集会权力的条款中，曾经被毛看重过的举行大辩论和张贴大字报的权利被取消，民主运动遭到了压制。（438-441 页）

- 历史决议作出了邓所希望的带有平衡性质评价的同时，也揭示了毛所犯下错误的原因：“当他的威望不断上升的时候，他变得骄傲起来，并把他本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他的同事没有采取防范措施，集体领导被削弱。党内民主没有制度化，有关的纪律缺乏权威性。斯大林主义的领导模式和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448-449 页）

四、中国政治的转型与国际环境

1971 年，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中国重返联合国。次年，尼克松访华以及中日邦交正常化。在此契机下，中国回归国际社会。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的新格局，中共把国际社会划分为三个部分，即“三个世界论”。日本处于“第二世界”，对于提出推进“四个现代化”的中国来说，加强同日本的合作关系成为优先考量的政治课题。此外，“三个世界论”中还包含如何处理与“第一世界”的美苏以及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毛泽东所提出的这一战略思想并没有由于“历史决议”的通过而得到批判，新的理论体系与此一脉相承。换言之，在如何重新定义“毛泽东思想”这一问题上，“三个世界论”无疑成为其中的一个论据。

本章整理了以上著作中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1978 年 12 月）、中日友好条约签订（1978 年 10 月）、中美建交（1979 年 1 月）、对越战争（1979 年 2 月）等国际环境的相关叙述。

1、傅高义《邓小平改变中国》

- 1977 年夏天邓小平重新掌管国防和外交工作后，面对着两个首当其冲的问题：一是对抗苏联和越南的威胁，维护国家安全；二是为争取外国对中国现代化的帮助打下基础。他努力加强与邻国的关系，阻止苏联的势力扩张。为了给中国的现代化争取帮助，他转向日本和美国。与日本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与美国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并将中国带入一场对越战争。（371 页）

- 到 1969 年，苏联显然已经取代了美国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1975 年美国从越南撤军后，苏联和越南便趁此机会，填补了美国撤军留下的空白。在邓小平看来，苏联决心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越南则想成为东南亚的霸主。因此，中国要与立场相同的另一些国家——美国、日本和西欧各国——形成对抗苏联的“一条线”。邓小平认为苏越结盟对中国的威胁最大，因此

假如中国能对越南这颗棋子大胆下手，就能最有效地组织苏联的包围。（375-376，380页）

- 邓小平带着和解的精神而来，也带来两国人民可以共同生活在和平友好新时代的希望。很多人觉得，二战结束三十多年后，疗伤的时刻终于到来。日本媒体对邓小平访日的报导，大力渲染了访问的成功，增强的日中关系；在中国虽然电视机尚未普及，邓小平访问日本工厂时拍到的影片和照片，使中国民众看到现代化工厂的模样，使他们明白中国有多落后，以及要赶上世界水准所需的努力。（414，427页）

- 在美国继续对台军售的情况下，邓小平依然决定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这成为他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之一。邓小平知道，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会让中国更容易得到它在现代化建设中所需要的知识、资本和技术。邓小平的访问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未来观发生一系列的巨变。邓小平访美使中国民众见识到现代生活方式，使他们趋之若鹜。中国在1979年以后也经历了一场革命，其规模和持续时间远远超过毛的革命。点燃这场革命的火星固然有许多，但其中迅速形成燎原之势的火星，当推邓小平的访美。（458，478页）

2、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 那时候，从国际范围来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利机会：许多西方国家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产业结构正处于大调整的过程中，许多生产设备和资金闲置，市场萎缩，需要寻找出路；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加快经济发展，被称为亚洲的“四小龙”。（1131页）

- 1987年10月，邓小平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国批准书互换仪式。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他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接着，他又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去看看这个周边的发展中国家是怎样得到较快地经济增长的，特别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1134，1135页）

- 1979年1月，中美建交结束了两国间长达三十年的不正常状态，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它是两国关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为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接近，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各个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1140页）

- 中国在这时抓住“亚洲四小龙”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二次转移的机遇，欢迎海外投资，依托中国廉价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的比较优势，先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日方表示可以提供利息低的优惠贷款。在中国使用的外国政府贷款中，日本是一个大的户头。（1167-1168页）

3、天儿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新版》

- 中国外交最大的特征即是“准军事外交”。不论是革命的激进外交，还是和平共存的稳健外交，为对抗假想的“敌人”而组织多重的统一战线可视为是中国外交的基础。79年2月的中越战争，是为了“阻止苏联在东南亚的影响力”，78年8月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也明确记载了当时中方最关切的问题，即反对苏联这一假想敌的霸权主义。然而在那之后，和平的国际环境成为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因此，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在提到

“独立自主路线”为中国外交最大特征的同时，还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

- 1979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中共当局从过去的“武力解放”政策转变为“和平统一”政策。81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了九项对台方案，后来这成为邓小平所创造“一国两制”的原型。前述《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和中美之间正式确立外交关系的日子恰好是在同一天。此外，82年8月中共十二大召开的两周前，中美双方签署了美国承诺逐步减少对台武器出售的《中美就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的公告》（简称《八一七公报》）。由此可以看到，对台政策与对美政策是紧密相关的。自此，冷战时期台湾“前沿阵地”的作用在中美建立和平共存关系中失去了意义。

4、陈永发《中国共产党革命七十年·修订版》

- 文革结束时，中国大陆人民环顾四周突然发现，不仅他们的生活越来越落后于美国和日本这些资本主义国家，连跟在他们后面的亚洲四小龙也都把中国大陆远远抛在后面。这让人不禁质疑：同样是东方人，又有同样的文化背景，为什么中共所坚持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路线，努力学习文革中提倡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人民生活水平却依旧离亚洲四小龙的标准越来越远？文革期间中国大陆的封闭发展，最终迫使中共重新思考整个国家发展的基本策略了。

- 其实邓小平从来不认为欧美国家在政治制度方面有什么好学习的。然而，政治的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因此应该尽力改善中共与世界各国的关系。邓和毛的不同之处在于，邓不再刻意拉拢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把外交的重点放在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此政策下，中共与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正式建交，领导人物彼此之间开始互访，邓小平亲自到华盛顿从事亲善访问。1970年代，美国的国力日渐削弱，面对头痛的越南问题和伊朗问题，美国在军事外交上有求于中共，而中共也正渴望的到美国的技术和资金协助。因此，邓小平仍然遵循毛泽东的外交路线，开展联美制苏的政策。然而，中共尽管视苏联为首要敌人，但在对苏政策方面，也力求降低双方敌意。不过，邓小平为了打破苏联的军事合围，依旧发动了所谓的“惩越”战争。（896页）

5、波拉克《对美国的开放》

- 对美国开放是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之一。中美的和解反应了毛主席在世界大国中建立中国合法地位的决心，它比毛掌权27年中的其他所有外交政策都更具主动精神。就直接意义而言，中美关系的恢复完全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孤立和文革时代的隔绝状态。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它结束了中美之间长达二十年外交上不正常的状态。没有它，七八十年代北京若想出现在国际上将更困难，可能更难以成功。（462页）

- 以外交和军事领域为例，毛泽东的声誉在他死后十年中还基本保持着。1981年6月，在中共的历史决议中对此作了如下宣布：“他万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壓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对这一论断，很少有人出质疑。经历1/4世

纪，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主宰了包括了恢复对美关系在内的中国的对外关系。这在并没有玷污周恩来在国际领域声誉的同时，也深远影响了邓小平在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对外交政策进行的控制。

总 结

由以上当代中国政治转型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相关叙述可总结出以下四个论点：

第一，提出以上各种观点的学者都认为，中央工作会议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立论基础，指明告别文革路线的大体方向，并在此过程中，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掌握中央领导权。然而，将拟定告别文革这一方向总结为“改革·开放”路线的提出，有待更进一步的探讨。

第二，以四五天安门事件为契机，毛泽东在决定指名华国锋为其接班人的同时，也下决心停止邓小平的一切职务。在毛去世以及四人帮事件后，掌握党政军最高权力的华国锋政权在谋求巩固自身并不牢靠的权力根基的同时，政策上选择继承革命与经济建设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课题。如果说，“四人帮的覆灭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种想通过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去改造世界的希望之破灭。中国人在这种局势的转折中表现出的兴奋和释然，后来将会变成支持改革开放务实政策的深厚基础”¹³，那么，面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华国锋政权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第三，经过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四大自由”的废除）、清算文革并恢复刘少奇名誉、审判林彪·四人帮、历史决议的通过这一系列过程，毛泽东思想得到重新定义。正如傅高义所言，“在对党的历史评价中邓小平把握住一种微妙平衡：既充分赞扬毛泽东，以免削弱党的权威，又批判了毛泽东在大跃进和文革中的作用。党内高层对毛泽东在晚年犯有严重错误已形成基础广泛的共识，这使邓小平能够踏上新的征途。这条征途不会为毛泽东所赞成，但邓小平相信，这对中国是有利的。”¹⁴

第四，将苏联视为主要敌人的这种对国际政治的理解（三个世界论）是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前提之一。在此基础上才有了与美国的建交、同日本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国发展现代化所必需的知识·技术·资本的获得）、摸索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提倡“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以及台湾政策的重新定位。

¹³ 傅高义. 邓小平改变中国 (M). 天下文化, 2012. 270

¹⁴ 同上, 511-512 页。

現代中国政治の転換と中共十一期三中全会

田 中 仁

Convers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3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C of the CCP

TANAKA Hitoshi

要 旨

現代中国政治の転換と中共十一期三中全会に関する四つの論点——①中央工作会議と十一期三中全会，②1976年の中国政治，③毛沢東思想の再定義，④中国政治の転換と国際契機——について，関連研究の叙述の特徴を対照・整理することによって，中国改革開放史研究における新たな論点を探る。

担当委員（鄒 燦*）

<http://www.law.osaka-u.ac.jp/~c-forum/box2/discussionpaper.htm>

*大阪大学・国際公共政策研究科・助教